

書評

對穀物的反思： 最初期國家之深層歷史*

Against the Grain:

A Deep History of the Earliest States

林珣安 *Joanne Lin*

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教堂山校區生物統計博士

PhD, Department of Biostatistics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研究政治科學的人怎麼認知和理解「國家」會直接或至少間接影響這個學門領域有關「國家」相關知識的建構。舉個例來說，一個長期存在又十分有意思的爭辯是，究竟哪些要件(elements)構成所謂的「國家」？非常多的政治學者相信，領土、人民、政府和主權(sov^{er}eignty)是構成「國家」的四個要件，但從國際公法的角度來看，四個構成「主權國家」(sovereign state)的要件應該是：領土、人民、政府，以及和其它主權國家交往之能力。這也就是說，主權究竟是國家生成之前就會存在的一種現象或狀態，還是主權與國家兩者必須伴隨彼此同時存在，是一個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問題。

今日任何一個被接受的政治科學概念或是知識定有其歷史淵源，而非單純不同學科或不同學者間的思想交鋒。在探究構成「國家」要件有哪些

* James C. Scot, *Against the Grain: A Deep History of the Earliest Stat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的同時，有一些更為批判與側重歷史因素的學者對「國家」這樣的組織型態提出不同過往的觀點，從「國家」背後形成之動力切入，讓人們有機會重新思索經濟因素（而不是軍事或安全因素）與「國家」的深刻聯繫。

自西元 1648 年以降，主權國家或是今日許多人民認知上（但實際上未必）賴以生存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究竟為什麼會出現在人類的歷史中呢？人類為何要放棄原本狩獵和採集的生活模式，轉而以能動性極低的農牧業作為主要的經濟生活態樣，然後漸漸形成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國家」？這個問題並不容易回答，因為它的思考層次已經不是傳統政治科學的問題，而是人類學的問題，也同時是社會學、經濟學和法學一直無法全然釐清之難題。曾有不少人認為，定點式的栽種植物和飼養動物讓人類可以不用再居無定所的遊牧，並透過農牧形成以村為單位的聚落，然後逐漸形成有組織的社群，進而在過程中發展出象徵文明的若干法律秩序和一一系列的經濟生活。對於這樣的傳統觀點，任教於耶魯政治系的 James Scott 提出迥不相同但深具啟發價值的批判性見解。他從人類學和農業史的角度去考掘和反思，指出農業若是一種文明，也並非一種有助於多數人的文明。農業更多時候並不是嘉惠於農作生產者的經濟活動，而是滿足少數權力持有者攫取人力與物資的經濟制度。

在其 2017 年出版的新書《對穀物的反思：最初期國家之深層歷史》(Against the Grain: A Deep History of the Earliest States)中，Scott 借鑒大量的考古研究與人類學分析，石破天驚地指出人類社會六千多年前開始出現的農業其實並不是一種「進步」的演化。恰恰相反，像美索不達米亞平原這種被後人讚譽為世界文明最早起源的聖地，或是所謂農業興起的源頭之地，其實當時多數人民是終年忙碌於耕作，喪失原本更有助於身體健康的狩獵生活模式。由於必須更長時間的田間勞動，或是更多機會與牲畜接觸，還有徵收稅賦制度的不當，讓人民在農業生活模式中變得更為辛苦、弱勢和卑微。Scott 進一步表示，人類歷史中最初期國家的形式是由一群極具私心的菁英所創，他們為了讓多數人願意定居在特定範圍的土地上，開

始大力鼓吹農業，並透過農業的發展把人民組織化。以歷史上關於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資料為劇，這個區域的土壤條件特別有助於農作物生產，因此讓人誤解為是文明或農業的發源地，但其實從游牧走向定居式的生活，從狩獵發展為農業的變革，對大多數生活於其中的人民來說是一場弊多於利的災難，單單土地的肥沃並不具有吸引力。**Scott** 的研究和其所蒐集的資料顯示，農業社會中的人民其實生活的比狩獵採集時更加辛苦與易罹患疾病。同時，考古所獲得之骨骼化石證據也顯示，當時生活在美索不達米亞農村聚落的人，其體形較游牧社群的人為小、牙齒狀況較糟、營養不良的機率更普遍、因疾病死亡的人數也更多。

此外，歷史上不少剛成立的農業國家是很脆弱的，十分容易出現內部分裂或是完全崩解的情況，但這些分崩離析的情況卻相對較少成為研究者關注之對象，導致政治科學界忽略了人民與國家更為深層的關係，例如：人民在什麼情況下會揭竿起義、會拒繳稅賦，或是為什麼動物性的傳染疾病一直難以杜絕等等。毋寧，如果沒有對成立國家的迷思或是對於國家過度的尊崇，作為個體的人相較於作為一國人民的個體，可能未必會較不安全。**Scott** 在其書特別提醒我們兩件事；首先，定居式的農業慣於飼養家畜，因為獸力可以分擔務農的勞動，但這也大幅提升跨物種間疾病的傳染率，而這樣的現象隨著農牧工業化之後變得更加明顯和嚴重，甚至幾乎將人類社會推向一個高風險的公衛危機。事實上，早在 2017 年 **Scott** 發表本書之前，另一位從宏觀歷史看人類社會演進的學者 **Jared Diamond** 也曾提出類似的觀點，認為農業是人類歷史上值得深度反省的一項「成就」。其次，穀物並不是我們人類唯一的糧食來源，但為什麼許多國家無論是否境內的地理條件適不適合種植穀物，都強調基於糧食安全的考量應該要有自己的農業呢？**Scott** 認為這是因為穀物是唯一有利於國家形成和壯大的經濟資源。進一步說，穀物與其它農作不同，以馬鈴薯和地瓜為例，這類農作的生長較不受季節與時令之限制，所以收稅的政府官員不可能在固定時間一

次收齊農村中所有馬鈴薯或地瓜來充實賦稅。此外，地瓜易於儲存，農民可以存放到需要時再取出使用，相較於穀類作物比較容易躲過政府稅吏的稽查。易言之，穀物的生物特性讓其得到政治菁英的青睞，正是因為絕多數的穀物不宜久藏，但卻容易估算生長期和便於查刻與運輸，因此成為許多政治權力者刻意選定之糧食來源、稅收單位和曆法基礎。

從一種「社會建構」的觀點來看，游牧民族或是非定居型的族群（例如：吉普賽人）在當前主流觀點中是較為落後的與相對弱勢的，因此這樣的群體在某程度上是被許多人認為應該要盡快歸順於國家，透過臣服與隸屬於國家，這些游牧與非定居型的族群才能得到保護。正是因為這樣的觀念（例如：沒有國哪有家？覆巢之下無完卵）不斷在人類社會中被重製與教育，所以無形中鼓勵與強化了定居的意識（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買房」）或是在許多制度設計上讓定居者與國家產生更深但並非對等互惠的連動。事實上，任何一個國家要獲得穩固與安全就必須要對人口的流動和經濟資源的掌握有效管理和精準控制，而農業是達到這個目標的基本關鍵。依據 Scott 的研究，農業的發展讓植物與動物可以更為容易地被人類組織化和工具化，透過設立農村讓土地的範圍、作物的產量和勞動力均得以被國家精確估算。所以，國家與其說是為了保衛人民而存在的，不如說是少數權力慾望者為了強化其控制（人力與資源）而設計出來的，而支撐這個設計的基石就是農業（以農立國）。

《對穀物的反思：最初期國家之深層歷史》幾乎完全顛覆政治科學對於國家的傳統理解，甚至比許多教科書中的反思主義更加批判地對「國家」存在之正當性提出質疑。Scott 在書中不諱言地承認自己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他眼中的國家是歷史上許多自然人的安全威脅與災難根源，而不是教科書上說的保障或依靠。書中總共提及四個因素可以直接或間接佐證他的觀點：

1. 國家對土地上沒有經濟貢獻的人習慣性地加以歧視和邊緣化
2. 國家強烈的迷信科技萬能，認為科學能夠解決許多問題

3. 無論是民主或非民主，國家一直都是少數菁英所有而不是全民共有
4. 與第三個因素緊密相扣，就是虛弱的公民社會是人類歷史的常態，而這與 Robert D. Putnam 和 Joel S. Migdal 的研究相呼應。

總的來說，這本書反思的是國家這樣的政治集合體如何不當的攫取穀物，而不是對穀物本身的生產加以否定。Scott 想要提醒他的讀者，平民百姓或升斗小民在作為農業生產者時，很難不受到地主、地方官吏、稅賦制度等因素的影響。但考古和歷史的證據一再顯示，農民如果決定揭竿起義發動抗爭，往往不是因為被剝削太多或獲利太少，而是自己所能賴以維生的穀物所剩無幾。一般人民的經濟理性和資本家不同，「迴避風險」與「安全至上」是人民優先的選擇，若不是因為生存的底限受到壓迫，反叛的行為鮮少出現。正是因為這樣深刻的觀察，讓我們得以看見國家的形成與強大是建立在無助於人民或是壓榨人民的制度上，而這個制度的原形或根基是我們長期自詡為文明泉源的農業。

責任編輯：賴郁璇

